

# 方家讲坛

先生特别强调比较考古学、比较文明史之研究，认为中国古代文明乃是人类文明全体的一部分，不以人类文明为大背景考察中华文明，而是关起门来，自说自话，就不可能对中华文明有真正透彻的理解。

先生又倡导「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之论以及「走出「疑古」时代」之论，力图重建中国人自清末以来业已丧失殆尽的对于本国文化的「真正自信」。

先生之努力非仅「为往圣继绝学」，更欲「为万世开太平」，为这落难四百年的「华夏文明」之起死回生，指明一个方向……  
先生说：「史学的终极目标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非但赚不了钱，还需要你去牺牲。」

# 中国文明

## 李学勤讲中国文明



# 中國文明

李学勤讲中国文明

方家讲坛

李学勤  
张耀南  
编著



東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李学勤讲中国文明 / 李学勤 著 张耀南 编.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8. 12

(“方家讲坛”系列丛书 / 恽哲 主编)

ISBN 978-7-5060-2757-1

I.李… II.①李… ②张… III.文化史—中国—古代 IV.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41073 号

**李学勤讲中国文明**

著 者: 李学勤

编 者: 张耀南

责任编辑: 陆丽云

特约编辑: 万方正

装帧设计: 奇文云海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6

印刷: 北京市文林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网址: <http://www.peoplepress.net>

版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 30.25 插页: 12

字数: 519 千字

书号: 978-7-5060-2757-1

定价: 58.00 元

## 自序

当我收到这本《李学勤讲中国文明》的校样的时候，深怀着强烈的好奇心。

近几年，我出过几本论文选集，如1999年安徽教育出版社《当代学者自选文库》的《李学勤卷》，2005年上海辞书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文库》的《李学勤文集》，各收小文七十篇。几本选集都是我自己编选的，难免有缺乏自知之明和敝帚自珍的毛病。现在这本《讲中国文明》，从头到尾是东方出版社编者先生选辑的，我工作中哪些见解和文字能入编者法眼，自然是我急于知道的。

这本书专选我从不同角度考察中国文明的论作，做了适当的剪裁。中国文明是人类历史上唯一有上古独立起源，又能延续至今的文明。中国文明是这样悠长而且丰富，更具有多地区、多民族的特色，我虽学习研索多年，真能略有所知的只是其前面的一段，即文明的起源及早期发展。我曾几次建议，将这一段文明进程的研究作为一个特殊的学科看待，就称为“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研究范围的时间跨度，与《史记》的内容差不多，大约上自传说中的炎黄时期，下至西汉。《讲中国文明》的编者充分注意到这一点，所安排的八章便是由文明起源的探索开始，以至古代文明和古文字、古器物、古文献的关系，可称颇见匠心。

最近，由于征引湖南科技学院张京华教授的文章，承他寄赠新著《中国何来轴心时代》，绎读之下有不少感触。书里面以大量材料，说明在德国学者雅斯贝斯提出“轴心时代”论之前，中国好多著作已有类似论点。所谓

“轴心时代”，在中国是指春秋晚期到战国诸子百家的争鸣，这无疑是中国文明发展的第一个高峰，但这一高峰的形成，还有其长期的渊源和酝酿，仅溯至周初可能仍是不够的。张书说：“虽然‘轴心时代’理论对诸子学研究予以积极影响，但对中国文明更早源头的经学、王官学却有继续漠视的负面危险，其影响将是源与流的颠倒、正题与反题的倒置和各期学术史的逐次错位。”这段话很值得大家寻味。

2008年4月，我应邀在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明伦堂讲会作了一次演讲，讲题是《中国学术的缘起》，记录后来发表在6月30日的《光明日报》上。我说，孟子讲孔子是“集大成”者，“集大成”意思就是综合和总结前人，继往开来，这表明孔子以前有着深厚的学术传统。孔子之所以伟大，正在于他能在传统的基础上创新，开拓了学术的新时代，将中国文明推向高峰。可是有的学者，如清中叶以后的今文学派，为了尊孔，淡化甚至否定孔子以前的学术。极端的像廖平先生，经学六变，最后竟说中国文字是孔子造的。这样，孔子还能称为“集大成”吗？当然，也不可反过来，为了贬孔，过分强调孔子以前的学术，取消孔子开创的作用，那样他也不能称作“集大成”了。孔子是中国文明第一个高峰时期，即所谓“轴心时代”的代表，其实诸子百家也无不是以前学术传统的延伸。在这里，我们看到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必要。

关于中国文明起源及其早期发展，包括这一文明的第一高峰的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希望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小书能使大家对这个诱人的学术领域产生更大的兴趣。

谨向书的编者表示感谢。要专作说明的是，书中图片及其文字都是编者先生加的。

李学勤

2008年9月28日

于清华园

# 目录

自序	1
第一章 不可怀疑的文明	1
一、走出疑古时代	1
二、谈“信古、疑古、释古”	14
三、关于“疑古时代”	20
第二章 中国文明之源远流长	23
一、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	23
二、古史、考古学与炎黄二帝	44
三、古本《竹书纪年》与夏代史	51
四、古代文明与文化发展战略	59
五、东周至秦代文明概观	61
六、中国考古学与古代文明研究	77
第三章 三代离我们有多远	85
一、夏商周离我们有多远？	85
二、天下之中	94
三、古代文明研究与“夏商周断代工程”	96
四、“夏商周断代工程”作为科研项目的特点	101

五、“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文献学基础 .....	103
六、“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方法的特点及成果 .....	109
七、对“夏商周断代工程”的西周金文历谱 .....	117
八、学科结合的必然趋势 .....	122
九、文明起源的科学考察 .....	124
十、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 .....	126
<b>第四章 《周易》在中国文明中之分量 .....</b>	<b>129</b>
一、关于《周易》的几个问题 .....	129
二、帛书《周易》的卦序卦位 .....	135
三、从《要》篇看孔子与《易》 .....	145
四、孔子、朱子论《易》异同 .....	151
五、帛书《周易》的几个问题 .....	159
<b>第五章 中国文明之地理的分布 .....</b>	<b>175</b>
一、多彩的古代地区文化 .....	175
二、非中原地区青铜器研究的几个问题 .....	181
三、丰富多彩的吴文化 .....	187
四、安徽南部的青铜文化 .....	196
五、商代通向东南亚的道路 .....	202
六、阿富汗席巴尔甘出土的一面汉镜 .....	209
七、韩国金海出土的西汉铜鼎 .....	212
八、日本胆泽城遗址出土《古文孝经》论介 .....	214
九、爱尔兰出土中国印章的传说 .....	220



<b>第六章 古文字与中国文明</b> .....	223
一、文字起源之谜 .....	223
二、汉字——中国对人类文明的重要贡献 .....	229
三、古埃及与中国文字的起源 .....	234
四、中国文字与书法的孪生 .....	241
五、甲骨文的世界 .....	245
六、甲骨学的七个课题 .....	255
七、殷墟甲骨发现一百年 .....	261
八、西周甲骨的几点研究 .....	271
九、殷墟出土的周人甲骨 .....	291
十、金文的形形色色 .....	295
十一、论孔子壁中书的文字类型 .....	305
十二、战国文字研究 .....	309
<b>第七章 古器物与中国文明</b> .....	317
一、中国青铜器及其最新发现 .....	317
二、中国古代青铜器艺术的两个高峰 .....	331
三、青铜器与商周文化的关系 .....	341
四、谈长江流域的商代青铜文化 .....	346
五、眉县杨家村新出青铜器研究 .....	353
六、西周青铜器研究的坚实基础 .....	369
七、中国铜镜的起源及传播 .....	381
八、中国和中亚的马车 .....	391
九、曲阜周代墓葬的两种类型 .....	397



第八章 沉睡地下的文明史 ..... 403

一、新出简帛与学术史 ..... 403

二、云梦睡虎地秦简概述 ..... 414

三、江陵张家山汉简概述 ..... 424

四、中、日、英三国出土木简 ..... 436

五、简帛和楚文化 ..... 442

六、楚帛书中的古史与宇宙论 ..... 453

七、简帛书籍的发现及其意义 ..... 461

李学勤先生学术编年 ..... 471

编后记 ..... 475

## 第一章

# 不可怀疑的文明

## 一、走出疑古时代

### (一) 考古与思想文化研究

谈到近年来的考古发现，特别是一些新的考古发现，它们对研究古代历史、文化，特别是在座各位关心的思想文化会有什么影响，这个题目，还是很值得研究的。考古发现对研究历史作用很大。这一点，恐怕现在所有的人都承认。这点恐怕是一个常识。不过，很少有人想到它对研究思想文化的作用，大家都重视得不够。关于它有这种作用，很多人不这么看。为什么？我想这里有个原因，就是早期的考古学本来就不强调思想文化的研究。特别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里，英国的柴尔德，就是 Gordon Childe，他给我们带来一种影响。大家知道，柴尔德这个人在一定意义上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比如从他的书，像《历史上究竟发生了什么》等等，我们可以看出他基本上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我们可以注意到的是，他带来了早期考古学上的丹麦学派的影响。因为丹麦学派本来是搞博物馆，它的创始人就是发明“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这些词的，他们都是搞博物馆的，光摆东西，不大讲，当时也不可能讲思想文化。所以，柴尔德的书也带来了一些这样的影响。我们大家都知道，在前苏联，很长一个时期里，

他们的考古研究所不叫“考古研究所”，他们不用“考古学”这个词，是叫“物质文化研究所”。什么叫“物质文化”？这个词不大清楚。因为考古发现的东西是不能用“物质文化”来限定的。考古挖出来的东西，怎么都是“物质文化”呢？我自己从来都不这么看。所以，我写那本《东周与秦代文明》的小册子，里面就特别讲到一段话。后来好多人都引用这段话，幸亏大家觉得还可以。那意思就是说，考古学发现的东西，比如一个墓葬，它总有一定的葬仪，一定的礼制，这些东西都是反映当时的社会，当时的风俗习惯。如果你只是从物质上来看，那么，这样的考古学，它的作用就很值得考虑了。这是我的一种看法，向大家请教。那么，今天我就想讲讲考古文化对精神的东西有什么影响。

## （二）两种考古证据

我想大家都知道，把考古学的东西和历史学的东西放在一起研究，特别是把地下的东西和地上的传世文献放在一起研究，从方法上讲，是大家尊重的王国维先生提出来的。王国维先生提出“二重证据法”，即地下的与地上的相互印证，这是很有名的。它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王静安先生是讲“二重证据法”，最近听说香港饶宗颐先生写了文章，提出“三重证据法”，把考古材料又分为两部分。这第三重证据就是考古发现的古文字资料。如果说一般的考古资料和古文字资料可以分开，那么后者就是第三重证据。像楚简就是第三类。考古学的发现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有字的，一种是没字的。有字的这一类，它所负载的信息当然就更丰富。有字的东西和挖出来的一般东西不大相同，当然也可以作为另外的一类。

我是不是先用比较简单的话说说那些没有字的东西？没有字的东西，在我看来，对于精神文化的某些方面，甚至于对古书的研究也很有用。我特别推荐考古所张长寿先生写的一篇文章，在《文物》1992年第4期发表，题目叫《“墙柳”与“荒帷”》。特别是里面讲了铜鱼，这见于礼书的郑玄注，用考古材料一讲就清楚了。类似这样的研究，今天不可能多谈。考古发现的东

西，或者遗址，或者墓葬，或者建筑，或者服饰，或者各种器物的形制，都可以了解古书的真伪。像墓葬中这些铜鱼，作为棺盖上的装饰，一串串的，现在我们知道，这些东西主要都是西周晚期到春秋时期的，最近在三门峡的虢国墓地发现这种铜鱼很多。墓打开一看，张长寿先生在那儿说，这和我们在沔西挖的东西一样。我们挖的墓大多是盗过的，这儿是完整的。这样一些材料，可以印证古书的一些讲法。那我们大家就可以知道《仪礼》这本书确实是讲春秋的，至少是有相当一部分是和春秋时代有关。

这些都是没有文字的东西。我想这些是比较直接的。还有一些是比较间接的。既然是间接的，那就不一定很准确了，但我们还是可以有一些体会的。比如说前一个时候大家都看到良渚文化出土的大玉琮。那种琮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你从侧面看是一个玉琮，但从上面看就是一个玉璧，是按照璧的形式做的。很多人都知道璧是礼天的，琮是礼地的，这个大玉琮是把天和地结合起来的。当然这一点仅仅是推论，不能直接证明一定是对的，可是至少还是有一定道理的。讨论良渚文化的朋友有这样的看法，我个人也有这样的想法。当然这些是间接的，不像我们刚才说到的铜鱼，是可以直接看到的。这类情形，我们还可举很多例子。它不仅可以证明我们对很多问题研究得不够，而且还可以证明很多古人本来讲的是对的东西，后人却怀疑起来了，结果最后证明，他们的看法还是对的。

有一个例子可能不恰当，聂崇义的《三礼图》，它的内容很多可能是从汉代和六朝的一些图传下来的。它把器物每每画成一种动物形状，背上背着个尊。宋仿的铜器很多是这个样子。后来人就说这种东西是杜撰，实际不是这样，没有动物身上背个尊的。现在像这样的东西出了好几件，最近文物精华展上看到的一件，完全是这个样子，可见《三礼图》虽然画的不一定都对，但是并非毫无所据。所以，我们对古代的东西别那么轻易怀疑。

当然，今天更重要的东西还是带文字的东西。带文字的考古发现，即第三重证据，是更重要的，它的影响当然特别大。王静安先生讲近代以来有几次大的发现，都是带文字的材料。（上世纪）20年代，他写了《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你们知道这篇文章最早发表在哪儿吗？先见于《清华周刊》，后来又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科学》杂志是卢于道主编的，他和秉志、胡先骕等是当时的留美学生，这些人回来后成立了一个

中国科学社，出版了《科学》、《科学画报》，后者由卢于道和他的夫人卢邵濂容编辑。说起这两个人，我总是带着敬佩之情。虽然今天我是学了文史，可原来是想学科学的。我有一点科学知识，都是从他们的这两种杂志学来的。王静安先生的文章就是印在《科学》杂志上，我过去曾经有过一本，现在是珍本了。

王静安先生说，中国历代发现的新学问都是由于有新的发现。他举的例子很多，最重要的是汉代的孔壁中经和西晋的汲冢竹书，都是地地道道的古书。这些古书发现之后，对于中国文化和学术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这种作用到今天还能看到。我们今天的新发现至少不比那个时候少吧？可是有一点，重要性差些，比如我们还没有发现《尚书》。张政烺先生总是说什么时候挖出《尚书》就好了。

现在的发现还没有《尚书》，可是至少从数量上说，比起古代一点不差，因此它的影响是特别大的。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屡屡有一些新的东西发现，这些发现使我们直接看到当时的书。我自己认为，对这些东西做全面和彻底的研究，恐怕不是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做得到的。因为比如汲冢竹书，一直到清朝还有人研究，对古史研究作用很大。所以这一类新发现，它的影响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看到。

对考古学的作用，我发表过一个看法。古代的东西无论在空间还是时间上与我们都有一段距离。这个距离，必须通过信息才可以越过。古代给我们的信息就是古书，除了这个没有第二条路，可是考古学的东西不是这样，那是另外一条途径。古书是历代传下来的东西，它是曾被歪曲和变化的。不管有意无意，总会有些歪曲，而考古获得的东西就不一样，我们是直接看见了古代的遗存。现在我们有了机会，可以直接看到古代的书，这就没有辨伪的问题。

古书的面貌和我们的想象是大不一样的，这一点我们要有充分的认识。有时候我常常说，我们应该用我们的感受去体会孔安国，或者束皙、荀勖这些人的重大成果。孔安国作隶古定，那时候他对战国文字毕竟不大懂，所以弄出很多问题来。当然他在某些点上比我们认识得更多，可是基本上他已不很了解，就像今天我们很多人已不认识繁体字。繁体字离开我们才多少年？社会上繁体字还存在，可当时社会上已没有古文流行，人们没有这种教养。

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古书是一种新的信息途径。它使我们可以直接看到当时人的思想、学术，这个机会是前人没有的，因为至少两千年来很少有这样的机会。过去很多东西都糟蹋了，像王僧虔所见的所谓蝌蚪文《考工记》，结果根本没有传下来。还有傅奕本的《老子》提到，在徐州发现了项羽妾墓，墓里面发现了《老子》，可是没有人把它记下来，只是做了一点儿校勘，也不知道哪些是从项羽妾墓来的，是不是就是《汗简》里的《古老子》？所以今天我们要做的第一步是把新发现的这些书整理出来，把这些信息记录下来，发表出来。至于说，我们学术界要想充分吸取这些东西，得到它的影响，那还仅仅是尝试。当然，今天它已经起了很大作用。

我们发现的这些东西，在现已发现的这类材料里，我想今天大家最需要的有一种就是秦律和汉律。过去研究汉律，比如沈家本、程树德专门辑录汉律，他们钩稽汉律费了那么大劲，至于秦律简直不成条，所以程氏的书只叫《九朝律考》，不敢叫《十朝律考》。近年我们居然在云梦睡虎地和龙岗两次发现了秦律。秦律我们发表得还比较快。现在江陵张家山两批汉律竹简还没有发表，但可以告诉你们，材料好极了。我老劝人不要急于去讨论什么“隶臣妾”，最好稍微等一下。因为我们的材料太多了，如果你说错了的话，马上没办法。张家山简数量很大，第一批和云梦睡虎地的简差不多，总在1200枚左右。睡虎地随葬秦律的那个叫喜的人是个令史，他抄的那些律，很多重要的东西都没有。随葬张家山第一批汉律的那个人我们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但他的官职比睡虎地的官要高，他抄的律很多都是刑律。这批简给我最深的印象是《盗》、《贼》二律，它的细致程度比起唐律并不逊色。它考虑的各种细节，比如杀人吧，涉及各种不同的情况、各种不同的对象以及亲属关系等等，非常非常细。从这一点看，从汉朝到唐朝的发展不是很多。

另一个大家最关心的是马王堆帛书的《周易》，特别是《易传》。关于《易传》，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个《易传》中的《易之义》比今本《系辞下》多出很大的一段，而这一段和今本《系辞》有同样的哲学意义，这当然极其不得了。

当然除这些还有其他一些很重要的发现，比如定县八角廊的西汉竹简《论语》，估计还保存有今本的百分之七十五。另外还有《周易》，那是阜阳八角廊汉墓出的，是占卦用的，像《火珠林》这类玩意儿。



那么现在问题是我们发现这么多东西，现在看起来绝大多数是佚书，即使是今天还有传本的，也很不一样。比如马王堆帛书《老子》怎么会把《德经》放到《道经》前面？这个问题需要讨论。台湾一些学者的那个意见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就是抄写时把上下篇给拿错了。当时是抄写上的错误，造成了一种暂时流行的本子。这我自己是不接受，但还是可以考虑。

### (三) 学术史的再认识

以上所说，引起种种的问题。我认为，今天它对我们学术史研究的影响还不仅仅是这些发现的东西本身。我们看见《周易》经传这些东西，当然对研究《周易》有很大好处。我们看到《老子》，对研究老子很有用；看到《孙子》，对研究孙子很有用。但我以为更重要的一点，是这些出土的东西所显示的当时的学术面貌。这种面貌和我们过去的估计相当不一样，这件事是个大问题。因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我们今天的学术史研究有一个改观的必要。

当然如何评价这个影响，今天我们还做不到。虽然我比在座的几位痴长几岁，但就连各位也不可能完全看到其结果。因为发现太多了，不断出现，必须深入研究到一定程度，才能看到其成果。可是有一点今天我们已经可以说的，就是学术史恐怕得重写，这不仅是先秦和秦汉学术史的问题，而是整个学术史的问题。在这一点上它是特别重要。今天已经可以认识到，过去我们的一些结论，受过去出现的思潮影响认识到的学术史的面貌，现在看起来与事实有相当大的距离。

我们的思潮是什么呢？就是大家都深受影响的疑古思潮，下面我说说这方面的一些看法。

你们大概都看过我在《人文杂志》增刊上的一篇文章。这里我得做点儿说明。从小我就读过《古史辨》，小时候我有一次走到旧书摊上，买到一本《古史辨》第三册的上本，看过之后就着迷了，后来把整个《古史辨》都买来看。从晚清以来的疑古思潮基本上是进步的，从思想来说是冲决网罗，有很大进步意义，是要肯定的。因为它把当时古史上的偶像一脚全都踢翻了，经书也没有权威性了，起了思想解放的作用，当然很好。可是它也有副作用，在今天不能不平心而论，它对古书搞了很多“冤假错案”。



从晚清而起的这股思潮不只是中国有，外国也存在，如日本的白鸟库吉，他不是写过“尧舜禹抹杀论”吗？在日本也成了名文。奇怪的是这篇东西在中国怎么没见过？我觉得现在应该翻译翻译了。西方如马伯乐，他写的东西也是这个作风，而且也是比较早的。晚清以来的看法为什么在中国会造成这种影响？还可以向上追溯到清代的学术史。

我一直认为清儒的学术是做出了巨大成绩的，可是，它有一个极不好的地方，在今天还有影响，就是它很讲门户。当然这一点，实际上晚明也有，晚明就有人开始讲门户，可是明末清初的一些大学者还是很博大。所谓“三大家”，甚至于像“四公子”这些人，不管他学什么，都是很博大。甚至一些较小的思想家，像江西的易堂九子，都很博大，还没有门户之见。但清朝自己的学术确立之后，特别讲门户，一点点讲，第一步是分汉、宋，首先就把宋学一脚给踢出去了。最初宋学的影响还是很大，像李光地这些人还是大受重视。可是后来汉学逐渐上升，汉、宋的门户就先分开来了。江藩的《汉学师承记》就是证据。分了汉、宋之后，再分西汉、东汉，把今、古文分开了。然后在今、古文里还要分，越分越小，眼界越来越狭窄，看的书越来越少。这个分门户的办法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辨伪。这个讲门户实在要不得。我觉得我们写学术史，一定不要这样。

有一点要指出的，就是在对古书的辨伪上，晚清的疑古思潮反而是继承宋学。宋人是开始辨伪的，在这一点上，它是完全继承了。宋明理学的一个特点，就是讲究直接读古书，不依靠汉唐注疏，这当然是好事。我常常说，他们对早期儒家的一些认识，在某些点上可能比汉代人认识的还正确些，因为他们直接读古书，不考虑后来的师说，可能有些地方是值得考虑的。不过这种倾向发展到末流，就变成了师心自用，特别是明朝一些人，简直是束书不观了。清人改变了这种风气，但门户之见在带来的副作用中是很重要的点。

#### (四) 古书新证 (甲骨金文)

我觉得我们今天研究古代文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还是真伪与年代。在这方面，有两本书可以作为标志，一本就是（上世纪）50年代张心澂的那部

《伪书通考》，各个图书馆都有这本书。（李零：国外汉学家也是必读此书。他们要用哪本书，总要先翻翻此书！）张心澂的书前面有一部分是讲方法论，举了多少条，代表他的辨伪方法。其影响之大，你别看余嘉锡先生那本书，也比不了。余先生的书，即《古书通例》，是上海出的。其实《古书通例》比张心澂写的好得多。第二部书就是郑良树的《续伪书通考》，不知大家看过没有？他也有讲方法论部分，对比一下就知道时代已经变了。做《续伪书通考》的这位郑良树先生现在香港中文大学，原来作过马来亚大学的中文系主任，是台大的早期毕业生。你看《续伪书通考》就可以知道，近二三十年来，关于辨伪方面的认识已有很大的变化，这是很明显的。这里起很大作用的就是考古发现。这可以说明现在的学术界对疑古思潮既有所肯定，也有所扬弃。这点对的，特别是我们从新发现来看，有些问题就看得比较清楚了。我想就古文字对文献的关系举几个例子。

我们先说简牍帛书以外的。简牍帛书以外的东西对于古书也可以印证，如甲骨文。有一点我要说明，甲骨文所能表现的东西是有限的，不能认为甲骨文没有的东西商朝就不能有。这点是很重要的，例如有学者已经指出，甲骨卜辞的文体并非当时的惟一文体，这种说法很有意义，因为各个时代都有一些不同文体，今天仍然如此。比如报刊上的社论，外交用的文件，和日常写的书信绝对不能比拟。甲骨文只能刻那么很少的一点儿字，它的文体一定是力求简练，不能用很多虚词。至于当时的一篇文章，就一定不同，如《商书》的一些篇和《商颂》，与商代有关系还是完全可能的。董作宾先生写过一篇论文叫《王若曰考》，文中引述了一版甲骨文，上刻有“王若曰：羌女……”等语。下面的“羌女”当然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但最好的解释还是“羌，汝……”，这是对羌人的一种文告，意思是王这样说：羌，你如何如何，可见当时就有“诰”这样一种文体。这样我们就可以证明《商书》里的“王若曰”，还有“微子若曰”，并不是周人所拟作。

还有一个例子，现在很多人都说甲骨文里没有四季，我从来不这么看。当然甲骨文到今天还没有找到“夏”、“冬”这两个字，可是这一点不等于说当时没有四季的观念。我们从常识来讲，也是这样。我这个人劳动下放去过好几回，农业还多少干过一点。我们知道，只要在华北这个地方住，是不可能没有四季观念的，这是很明显的道理。在甲骨文里有四方、四风，就是